



〔英〕彼得·詹金斯

撒切尔夫人的革命

新 华 出 版 社

D756109/1

撒切尔夫人的革命

【英】彼得·詹金斯

李云飞 陈封雄
于承智 程克雄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Jonathan Cape Ltd. 1987

据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1987年版译出

撒切尔夫人的革命

〔英〕彼得·詹金斯 著

李云飞 陈封雄 于承智 程克雄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插页2张 199,000字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50册

ISBN 7-5011-0587-1/D·98 定价：3.35元

DH57/24

出版前言

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程度不等地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发源地。这些政策曾暂时缓减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但是到70年代后期终于破产，英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冲突。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立志要扭转国运的衰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奉行货币主义为国策，强调依靠市场机制，以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为宏观经济控制手段，限制工会权利，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并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变革。这一套做法就是本书所说的“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它多多少少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某些弊端，收到了一定效果，并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

本书作者彼得·詹金斯是英国资深的政治评论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考察，于1987年撒切尔首相赢得英国本世纪空前的三连任以后，写成此书，对前两届撒切尔政府的成败作了总结。他首先阐述了撒切尔首相上台的历史背景，接着论述了她的各项变革，并对照反对党，主要是工党的政策主张，对“撒切尔夫人的革命”作了较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揭露了现今英国存在的种种问

题。因此，本书对于了解英国以至整个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撒切尔夫人口口声声所反对的“社会主义”，是指工党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她也是当今世界上一名顽固的资本主义卫道士和反共政治家，而本书作者出于其阶级立场，对撒切尔夫人的世界观不时流露出欣赏之情。同时还要看到，“撒切尔主义”不但象本书所表明的那样，不可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痼疾，而且还加剧着英国社会的矛盾。在本书出版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又上升到西方主要国家的首位，贸易逆差成倍增长，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第三届撒切尔政府的某些举措遇到了挫折，内阁一再改组，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声望急剧下降。所谓的“撒切尔夫人的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尚在演变中，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课题。希望读者多注意本书提供的情况，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撒切尔主义”对社会改良思潮的反动，而对本书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某些结论性意见则采取分析批判态度。

本书原文约合中文28万字。为压缩篇幅，译文删节了一部分过于冗长和次要的段落。原文第四章着重谈撒切尔夫人攻击集体主义，鼓吹个人主义。但在她执政的年代中，个人主义的泛滥已使英国社会的道德堕落到连前首相麦克米伦和希思等保守党人也发出哀叹的地步。这一章关于“道德问题”的冗长议论，均已删去。

目 录

第一部 旧秩序在瓦解

- 第一章 战后的不满..... (1)
- 第二章 衰落的政治..... (30)
- 第三章 是共识政治还是自信政治..... (41)
- 第四章 一个道德问题..... (54)

第二部 模式打破了吗？

- 第五章 并非常规的智慧..... (56)
- 第六章 工党向左转..... (77)
- 第七章 社会民主党的诞生..... (94)
- 第八章 撒切尔因素..... (106)

第三部 重振旗鼓

- 第九章 首相的政府..... (120)
- 第十章 战友们..... (148)
- 第十一章 石油采完了以后..... (172)
- 第十二章 捍卫国土..... (202)

第四部 确立了新秩序

第十三章	为什么撒切尔赢了	(232)
第十四章	为什么工党输了	(248)
第十五章	第三党的混乱	(255)
第十六章	永久的革命?	(259)
译者后记		(272)

第一部 旧秩序在瓦解

第一章 战后的不满

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过一句最使人难忘的话：“我不是一个共识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自信的政治家。”“自信的政治”这种自命不凡已成为她的风格的标志，正如同哈罗德·威尔逊^①所信奉的“在政治上，10天是个漫长的时间”，或者像哈罗德·麦克米伦^②把他好不容易才摆脱掉的一次内阁危机若无其事地说成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困难”那样，成为名言。政治家们正是以这些方式铸造了他们自身。

那么，她说自己不是一个“共识的政治家”，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她升起的时候，英国战后秩序的基础正在崩溃，我们就是要从这一点谈起。她以为她打破“共识”，但那种“共识”主要是基于想像而非现实。在政治领域内，想像和现实同样有力量。

“共识”这个词意味着整个战后时期各党政见大同小异，而且政

① 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政治家，1964—1970年和1974—1976年两次出任首相。——译注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于1957—1963年任首相。——译注

府（尤其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依照广泛的协商一致进行工作的。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与别的较有成就的国家相比，英国在方向上有过不应有的剧烈变化，通常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变来变去，一时执行国有化政策，一时又执行非国有化政策。1945年，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确实曾在全国遵循过它们在战时联合政府中共同制定的经济重建和社会改革的原则。那种共识精神虽然在程度上被夸大了，但在战后最初几年的确短期存在过，例如1947年的节约措施，其中包括削减食品供应量，对私人汽车不供应汽油，赴国外度假不能兑换外汇等。这些节约措施很快便得到报复。那些曾在1945年投向工党享受安乐的南部城市和市郊的中产阶级选民，在1951年和1952年，经过种种磨练，又回到保守党怀抱去了。

1951年以后，保守党政府便着手取消工党曾赖以制订生产计划和在节约条件下安排公平分配的战时和战后管制措施。虽然福利国家制度尚未受到攻击，然而福利经费从何而来，意见不一。某些福利是否要收费，以及是否要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来确定有无资格领取福利，各党争论不休。对工会毫无热情可言的丘吉尔，出于慎重的原因，曾对工会执行一项调和政策^①，这项政策或多或少地维持到1957年伦敦公共汽车司机大罢工时为止。但是到1964年，各种工会的权力地位加上它们享受的若干法律豁免权已成为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到60年代后期，“工会问题”就成了政党政治的支配因素。

爱德华·希思^②在1971年说：“从来没有过共识……各政党

① 这里是指丘吉尔1951—1955年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时，对战后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所推行的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译注

② 爱德华·希思——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70—1974年任首相。
——译注

在政策上从来就走不到一块儿。甚至于“巴茨克尔主义”的概念也是随便而且不正确的。”“巴茨克尔主义”的概念只是简单地将巴特勒和盖茨克尔^①两人名字的缩写合并起来，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当然，巴特勒和盖茨克尔两人都利用了凯恩斯主义^②的需求管理技术，试图以合理的稳定物价来维持那时的充分就业，其实任何一位英国财政大臣或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会如此。正如盖茨克尔传记作者菲利浦·威廉斯所指出的，巴特勒和盖茨克尔在货币政策、英镑兑换、国家管制和财富分配问题上都有相当尖锐的分歧。

当然，这种“巴茨克尔主义”的客套并没有延伸到英国工厂的车间里去，在那里，“他们”与“我们”之间依然是壁垒分明。在外交政策方面，下院的前座议员曾形成广泛的共识以支持大西洋联盟（直到苏伊士运河事件时艾登首相将共识破坏为止），但是这种共识并没有深入到工党内部，工党内的贝文派右翼和比万派左翼一直闹分裂。到60年代，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问题上，各政党便分道扬镳而且内部也闹分裂。总之，战后时期从来就没有很多的共识。“共识”变成一个极方便的替罪羊来为70年代经济失败和社会失调开脱。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最有利于撒切尔派责难各政党在凯恩斯主义上的沆瀣一气了。到70年代末期，真正崩溃的与其说是“共识”，不如说是从战争年代政党政治短暂停顿时期成长起来的战后和解。

① 巴特勒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40—60年代多次出任内阁大臣，其中1951—1955年任财政大臣时，因协助丘吉尔推行阶级调和政策，而有保守党开明派之称。盖茨克尔是英国工党政治家，1950—1951年担任过财政大臣，1955—1963年任在野的工党的领袖，有工党温和派之称。——译注

② 凯恩斯主义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的理论，鼓吹国家全面调节经济，刺激需求，以缓和失业和经济危机。——译注

战后，艾德礼^①政府基本上是受到前代人关于联合政府思想的启发而制定的社会政策，至少是为了促使阶级战争停火，而使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发生变形。维持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制度曾经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均可接受的目标，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脱离这些目标就会招致选举失败。这些目标不仅为战后的政治搭起了框架，而且也制订了议事日程，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都无从谈起。如何取得较快的和持久的经济增长，恰是战后经济政策尚未解决和日益迫切的问题。经济增长曾受到50年代末期越来越严重的收支紧张的阻碍，也曾受到经济“过热”和引发物价上涨趋势的阻碍。这些趋势又使收支平衡更加困难。哈罗德·麦克米伦把管理战后经济的事业比喻为需要一个“新的辛奎瓦利”的技巧。辛奎瓦利是一位杂技演员，能使四个球同时在空中旋转而不坠地。麦克米伦所指的四个球是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物价稳定和英镑坚挺。

由于人们对30年代大批失业景象记忆犹新，上述四个条件中，充分就业便占有首要地位。在英国，战后经济管理的模式是间歇的胀胀缩缩，最后因收支不平衡的危机而中止。这就是那令人沮丧而又无法避免的“走走停停的综合症”。这种“综合症”击败了每一届政府，直到1973年，这“长期繁荣”才告结束，而代之以“滞胀”——也就是完全停止不走了。

经济增长对于工党政府来说要比对保守党政府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要洗刷30年代的坏名声。为了维持作为“战后和解”基石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是必需的；不仅如此，如果原料和财

^① 艾德礼——英国工党政治家，1945—1951年任首相，第一个把凯恩斯主义和英国自由党人贝弗里奇主张的社会保险计划付诸实施，这就是本书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译注

富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轻重缓急顺序进行重新分配，经济增长也是必需的。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见解的要点是：全面国有化既无必要也不会受欢迎；如果以凯恩斯的方式来管理混合型经济，那就无需利用指令性经济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和平等（“修正主义者”的中心价值观）可以通过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来取得，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公共消费。但是只有当物力以足够快的步伐得到全面扩展时，所有这些才能成为可能。因为重新分配的正义如果要被充分地接受，每个人就必须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富足。那种劫富济贫的相反战略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不仅意味着劫富，而且也意味着向广大的富裕工人阶级索取。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大选失败。

后来，克罗斯兰承认他对于经济增长过分乐观了。实际上他认为生产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让一切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去处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即尽力去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这其实只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幻象。

在这里，他体现了一代人的希望。他不仅在他那有广泛影响的思想中，而且在他的生活作风上，都把社会义务和个人自由结合起来。

克罗斯兰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摆脱了普利茅斯兄弟会的严格宗教教育而在早年成为一个花天酒地的知识分子。他能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互不干扰，并行不悖。战争使他中断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当他回校继续攻读学位时，他竟成为领奖学金的研究生，教了三年经济学。当他还是大学本科生时，他的才华便被当时的财政大臣休·达尔顿发现了。达尔顿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好摆架子，但特别喜欢聪明而漂亮的男青年，因此他帮助克

罗斯兰当选为代表南格罗斯特郡的下院议员。在1950年，这是一个工党席位(到1955年便不再是工党的了)，是他事业中的过渡措施。最初他憎恨议会。议会使他厌烦并且不适合他那喜欢吹毛求疵的机智的胃口。当克罗斯兰不纵情酒色时，他便安心坐在安乐椅上用他那支昂贵的钢笔写出他的伟大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这本书出版时，他38岁。他22岁时曾在的一封信中宣称：

“我正在修订马克思主义并将作为现代的伯恩斯坦而出现。”

他确实如此出现了。这本书使他立刻成为比万派和正统主义者的眼中钉，但却给予整个一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启示。它以为追求平等为目标的道德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基础。它成为所谓“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圣经。虽然它从来没有正式被工党接受作为该党的学说，但实际上它在威尔逊和卡拉汉^①政府的行为中打上了烙印。

《社会主义的未来》为盖茨克尔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一年，盖茨克尔已经战胜了比万而继艾德礼成为工党领袖。达尔顿曾介绍克罗斯兰加入盖茨克尔的圈子，盖茨克尔在1959年帮助克罗斯兰重返下院。克罗斯兰尽管是“修正主义”的首要理论家，但一直不赞成盖茨克尔修改工党党章以便取消关于全面国有化承诺的第4款的企图。这个企图后来并未成功。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他倾向于崇拜实用主义。

盖茨克尔于1963年不幸逝世后，克罗斯兰逐渐不再是盖茨克尔派了。他并未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他不是一个搞宗派的人。可是他和盖茨克尔另一个宠信的门徒罗伊·詹金斯^②曾发

① 詹姆斯·卡拉汉——英国工党政治家，1976—1979年任首相。
——译注

② 罗伊·詹金斯——英国政治家，原属工党右翼，曾多次出任内阁大臣。1981年，他率领一批人退出工党，另立了社会民主党。——译注

生过嫉妒性的竞争。詹金斯认为盖茨克尔愿意和他结伴，只是利用克罗斯兰的头脑而已。詹金斯这一派的人越来越被认为代表“英国在欧洲”的事业。克罗斯兰则把这种现象看作是社会主义萎缩的症状。他一直赞成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坚持说这不是超越一切的问题。那些相信应该如此的人则我行我素，因为他们已越来越无法相信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由于这些原因，在1971年10月28日发生的那场历史性分裂中，他拒绝参加主要由前盖茨克尔派的人组成的亲欧洲右翼集团去支持政府。那天英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同时预示了10年以后工党的分裂。克罗斯兰坚持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宣称后者的定义似乎就是指那些准备脱离工党的人。

但是当克罗斯兰在1977年突然悲惨地去世时，我们看到，他的世界正在他周围坍塌。由于从个人消费中抽出经费来资助福利国家的公共支出，通货膨胀问题就更加恶化了。再者就是低生产率。他虽曾写道“有时英国的经济似乎无法管理”，但是他从未改变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地位的主张。他说：“我们可以肯定对于任何有意义的资源再分配来说，快速度经济增长是个主要条件。”1970年时，那是一个悲观的看法。1973年以后，当全世界都陷入衰退时，这种看法等于承认继续重新分配已经不可能，或者至少不会不发生克罗斯兰理论所推想的可怕后果。

不仅如此，正象他所看到的，问题早已不是如何完成进一步的财富再分配，而是如何对已造成的结果还债。缓慢的经济增长使福利国家的财政越来越成问题。从60年代初期开始，英国就被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福利费用增加造成增税，从而引起工资膨胀加速，于是福利开支更上升，征税也随之增长，如此循环不

已。福利费用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人口问题。老年和少年人口比例增大，负担便落在按比例说是在减少的工薪阶层和纳税人身上。另一个原因就是福利机关雇员数量的急剧膨胀。此外，很多福利都直接或间接和通货膨胀挂钩。1965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到1970年已升到41%，1975年更升到50%。1965年的税收可抵总支出的五分之四，到1975年便只能抵四分之三。于是福利国家的经费逐渐要依靠借贷了。

公共支出费用的快速增长，加上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靠工资生活的人陷入所得税预扣法之网。在50年代，平均水平的挣工资者不交所得税；1960年他们每人所付的税和保险费约占其收入的8%；到1970年就达到接近20%。1972年，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子挣着平均的工业工资，要直接或间接支付占其全部收入19%的税金；到1976年，这个数字增至26%。

这种现象代表着深刻的变化，其程度并不比福利国家所保证的全部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险小。所有劳动阶层的人本来都不习惯于交纳所得税。现在广大群众第一次成为纳税人。据丹尼斯·希利^①1976年的预算演说，最低收入这一级的人的纳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福利国家已使我们变成一个纳税者国家了。

对保守党政府来说，经济增长也是使人民感到高兴、在选举中获胜和不对战后和解增加太大压力的手段。麦克米伦永远不会忘记30年代他在斯托克顿见到过的失业惨状，具有所落后的或贵族社会意识的其他保守党人也牢记着使他们在1945年大选中遭受失败的30年代往事。这是普遍的看法。英国在50年代曾有过间歇

^① 丹尼斯·希利——英国工党政治家，1974—1979年任财政大臣。

——译注

式的繁荣。1952至1960年之间，实际收入（即扣除税款和国民保险金之后的购买力）每年平均增加2.8%。当盖茨克尔于1959年企图以经济增长作为竞选题目时，麦克米伦虽然一直是热诚的经济扩张主义者，但他却把这种想法当作新潮式的狂热而撇在一边，将它和当时风靡于舞厅的旋转舞相比。但是到1961年，他自己又跟着另一个调子跳舞了。由于英镑的超值和英国的帝国后行为过分扩展而正在严格地紧缩国际收支。“前进”之后突然出现“停止”，这次是伴随着“暂停涨工资”——自从1947年节约时期实行冻结政策以来，这是在限制工资上的首次试验。60年代来临了。

战后和解在政治议事日程上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劳资之间讨价还价制度或后来所谓的“工会问题”。这个问题主宰着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充分就业的要求变成了工会讨价还价的筹码。在零散的和竞争性的英国模式上，要使劳资间自由的讨价还价与维持合理稳定的物价下的充分就业相适应，并不容易。这一点渐渐变得明朗了。这个现实产生了两种后果，都很奥妙。为了保障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避免拙劣的限制工资政策，工会就要被请来为管理经济分担责任。在工会会员看来，这似乎就是工会勾结政府和雇主来压低实际工资。于是工会的全国领导权威受到了伤害，工会小职员的权利上升了，战斗之火被浇上了油。按照同样的程序，政府要对人民得到的一切都负责，不仅对工资的平均水平，而且对于一个护士和一个矿工或一位将军和一个警察的薪金差别都要负责。政府很快就感受到“社会正义”招牌下的无穷烦恼。

然而在战后和解的条件范围内，别无他择。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使麦克米伦的四个球同时在空中旋转。当威尔逊于1964年

藉经济增长的诺言上台之后，他不得不对工党的传统分工产生怀疑——工会运动的政治部分（即工党）只关心治理国家，而产业部分（即工会）则专注于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当时的职工大会总书记乔治·伍德柯克也看到事情不能照那样继续下去了，如果各工会本身无法牢牢抓住“工资问题”，政府就得插足进来替它们处理，办法是制订法律或者是放弃充分就业。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填补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空白，限制工资收入的政策是最好的工具。如果工人们能克制他们对货币工资的要求，从“向钱看”的憧憬中解脱出来，物价就会涨得慢些；这就能有持久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其结果会是实际工资的增长比它在一切免费条件下的增长来得快些。那只是理论。它永远不能经受试验，因为在每次试验完成之前，工会会员们就会失掉耐心。然而为了得到工会的合作或者至少得到职工大会的“勉强同意”，各级政府不得不首先进行直接干预以取得在物价上的相应限制；其次是致力于在集团和集团之间公平地运用政策，还要照顾到经济效率。一个物价和收入委员会被组成来研究这些准则。

物价和收入委员会是威尔逊时代的原型机构。它代表专家的最高水平和对解决问题的社会科学力量的最高信仰。委员会主席奥布莱·琼斯把它看作是一个将凯恩斯理论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机会。他后来写道：“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避免使凯恩斯开创的充分就业机会遭到失败。”但是它终于失败了。

收入政策最初是作为使工党完成其雄心勃勃的快速经济增长计划的工具。不久它就变成了为英镑超值而猛烈收缩通货进行辩护的工具。收入政策的运用和误用造成了逐渐加剧的劳资不和局面。在1963至1964两年内，大约400万个工作日因罢工而丧失。在1968至1969两年内，损失的工作日总数为1150万。威尔逊对这个